

战后日本的婚姻模式转型研究

曹有顺¹, 胡 澎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 要: 战后日本的婚姻模式经历了两次转型, 第一次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由“早婚普婚”向“晚婚普婚”过渡; 第二次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晚婚普婚”进一步向“晚婚不婚”演变。作为东亚国家, 日本有着重视婚姻与家庭的传统, 当婚姻模式进入“晚婚不婚”以后, 国民的婚育形态较之西方国家呈现出结婚意愿强、“单身寄生族”多、婚外生育率低的特征。在当代日本社会, 婚姻依然是组建家庭的前提, 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础单位。“晚婚不婚”模式给日本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不仅加剧了少子化, 而且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 还加深了社会的无缘化。当前中国的婚姻模式正在由“早婚普婚”向“晚婚普婚”转变, 在此背景下研究日本的婚姻模式转型, 对认识中国的婚姻模式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婚姻模式; 社会冲击; 低生育率; 人口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26)02-0029-13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26.02.003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①。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人口的再生产, 在结婚是生育前提的中国社会, 人口的再生产又主要依赖婚姻关系的成立。近年来, 中国婚姻领域出现了新变化,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全国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 2010 年的 25.75 岁上升至 2020 年的 29.38 岁, 女性从 24 岁上升至 27.95 岁^②, 社会出现了晚婚化现象。

收稿日期: 2025-12-15

作者简介: 曹有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博士; 胡澎,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2023 年 5 月 5 日, https://www.gov.cn/yaowen/2023-05/05/content_5754275.htm[2025-12-01]。

②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 2022 年 10 月 25 日, <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zk/indexce.htm>[2025-04-12]。

尽管当前中国的晚婚化趋势明显，但是终身不婚率^①仍然较低，2020年男性只有3.92%，女性仅有0.97%，可以说中国的婚姻模式正在由“早婚普婚”向“晚婚普婚”转变。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晚婚却普婚的案例在历史上很罕见^②，这意味着中国正步入的“晚婚普婚”模式很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模式，将来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中国的婚姻模式将何去何从？中国社会又将面临何种挑战？解答这一系列问题不仅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更需要从婚姻模式转型早于中国的国家中寻求参考。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国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有着相似的婚姻模式、家庭文化与传统，并且日本的婚姻模式转型早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晚婚化现象，90年代以后不婚化现象日渐显现并逐步加深，已经完成了从“早婚普婚”向“晚婚普婚”的转变，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晚婚不婚”模式。在中国婚姻模式正处于重大转型的背景下，有必要将目光投向日本，聚焦战后^③日本的婚姻转型，从时间维度上梳理日本从“早婚普婚”模式向“晚婚不婚”模式演变的轨迹；从国际视角出发与西方国家比较，考察日本在“晚婚不婚”模式下的婚育特征；通过综合分析的方法总结“晚婚不婚”模式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深入剖析日本婚姻模式的演变轨迹、“晚婚不婚”模式下的婚育特征以及该模式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或可为认识和分析中国婚姻模式转型提供有益参考。

一、日本婚姻模式的演变轨迹

日本的婚姻模式在战后经历了显著变化，我们可以从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数据中清楚地看到这一演变过程。图1是1950年至2020年日本平均初婚年龄和终身不婚率的变化图。

由图1可知，日本的平均初婚年龄虽然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的短暂上升期，但是总体而言，在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这段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较低水平，男性在27岁上下浮动，女性则维持在24岁左右。20世纪70年代以后，两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均呈现上升趋势，晚婚化现象逐渐显现并日益加强。当观察图1中终身不婚率的变化时，可以发现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的终身不婚率一直没有超过5%，维持着稳定且偏低的状态，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男性和女性的终身不婚率均开始攀升，不婚化现象显现并愈发深刻。

结合图1中平均初婚年龄和终身不婚率的变化曲线可以发现，日本的婚姻在战后呈现出

① 终身不婚率无统一衡量标准，有学者用45~49岁的未婚率来近似反映终身不婚率。但是，日本人口学界认为婚姻与女性生育能力一起讨论时，再生产年龄中的结婚时间点和最终累积频率非常重要，终身不婚率就是测量最终累积频率的尺度，一般来说指的是女性生产年龄上限50岁时的未婚率。本文参考日本人口学的界定，将50岁的未婚率视作终身不婚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官方统计未婚率并未逐岁统计，故此，终身未婚率实际上取的是45~49岁以及50~54岁两个年龄段的平均值，为保持一致，中国的终身不婚率也按此方法计算。参见陈卫民、李晓晴：《晚婚还是不婚：婚姻传统与个人选择》，《人口研究》2020年第5期；日本人口学研究会『現代人口辞典』、原書房、2010年、122頁。

② 陈卫民、李晓晴：《晚婚还是不婚：婚姻传统与个人选择》，《人口研究》2020年第5期。

③ 本文中的“战后”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三个阶段性特征: 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呈现出“低初婚年龄、低终身不婚率”特征;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呈现出“高初婚年龄、低终身不婚率”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后, 呈现出“高初婚年龄、高终身不婚率”特征。人口学家将“低初婚年龄、低终身不婚率”的婚姻特征称作“早婚普婚”模式, 将“高初婚年龄、低终身不婚率”称作“晚婚普婚”模式, 将“高初婚年龄、高终身不婚率”称作“晚婚不婚”模式^①。按照这样划分,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的婚姻模式在战后经历了两次转型, 第一次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婚姻模式由“早婚普婚”向“晚婚普婚”过渡; 第二次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后, “晚婚普婚”模式进一步向“晚婚不婚”模式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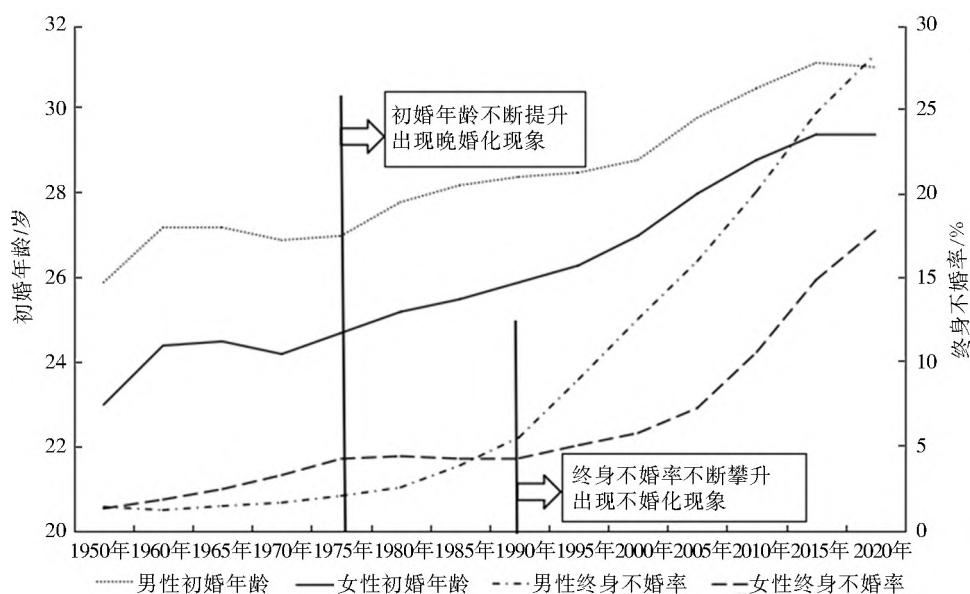


图 1 日本平均初婚年龄与终身不婚率变化趋势 (1950—2020)

资料来源: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 (2024 年版)」, 2024 年 5 月 10

<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24.asp?chap=6>[2025-05-10]。

(一) 日本战后的“早婚普婚”模式

战后初期, 日本在美国的扶植和援助下仅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便实现了经济恢复, 1955 年, 除贸易外的其他经济指标几乎都大幅超过战前水平^②, 日本经济自此迎来了令人瞩目的高速增长期。在经济高速增长期, 日本社会稳定而富足。一方面, 政治领域的“55 年体制”、就业领域的终身雇佣体系、家庭领域的“男主外, 女主内”性别分工共同维持着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 日本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国民收入实现“倍增”目标。据日本内阁府统计, 在 1956 年至 1973 年期间, 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均增长率高达 9.1%; 在实施“国民年收倍增计划”的 10 年里, 人均雇佣报酬增长率每年都超过 10%^③。长期的经

^① 陈卫民、李晓晴:《晚婚还是不婚: 婚姻传统与个人选择》,《人口研究》2020 年第 5 期。

^② 土志田征一『戦後日本経済の歩み』、有斐閣、2001 年、47 頁。

^③ 内閣府『令和 2 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2020 年 11 月 6 日、https://www5.cao.go.jp/j-j/wp/wp-je20/index_pdf.html[2025-05-12]。

济高速增长、收入的大幅提升让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意识。

在稳定而富足的社会环境中，日本人在婚姻领域构建出了一个“全民皆婚”社会。“全民皆婚”不仅意味着人人都有结婚机会，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愿意走进婚姻。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1950年日本男性的终身不婚率只有1.45%，女性只有1.35%，到1970年男性的终身不婚率只增长到1.7%，女性的终身不婚率虽因人口因素略有提升^①，但也仅仅增加到3.33%^②。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的终身不婚率保持着极低的水平，约有97%的日本人在50岁前结婚、成家。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不仅都结婚，而且是在较为年轻的阶段就步入婚姻。如图1所示，日本的平均初婚年龄在战后初期虽略有小幅提升，但是很快就进入稳定期，1955年到1973年的18年里，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仅从26.6岁提高到26.7岁，女性也只是从23.8岁提升至24.3岁，保持着稳定、偏低的状态。故此，我们可以看到，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人的婚姻处于“早婚普婚”模式之中。

（二）从“早婚普婚”到“晚婚普婚”模式

1973年的全球石油危机重创日本工业，一直备受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由此终结，日本经济步入了稳定增长的新阶段。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日本社会也开始发生转型，原本稳定的终身雇佣体系和性别分工模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一方面，1986年日本实施《劳动者派遣法》以后，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流动性较强的派遣员工，随着派遣行业范围的扩大，派遣员工数量持续增长，截至1993年已经达到65万人^③，这一趋势正在逐渐动摇稳定的雇佣体系。另一方面，自1985年日本出台《男女雇佣均等法》以来，各年龄段女性的就业率均有明显提升，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女性的“M”型就业模式^④，使日本女性逐渐朝着“去主妇化”方向发展^⑤，而且也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使“男主外，女主内”的界线开始趋于模糊^⑥。

日本人的婚姻在社会转型中发生了变化，尤为显著的是日本社会出现了晚婚化现象。晚婚化是指平均初婚年龄或初婚年龄中位数上升的现象^⑦，由图1可知，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后，日本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均呈上升趋势。据统计，1990年男性的平均初婚年

① 据日本人口学家的研究，在战争中男性人口大幅减少和战后第一次婴儿潮中的女性率先步入适婚年龄，导致战后长期以来日本女性面临着结婚难问题，等到1972年第一次婴儿潮中的男性进入适婚年龄后，情况才有所缓解。参见：日本人口学会『人口学事典』、丸善出版社、2018年版、61页。

②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 2025年版』、2025年4月30日、[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25.asp?chap=0\[2025-05-20\]](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25.asp?chap=0[2025-05-20])。

③ 厚生労働省「労働者派遣の現状について（全般）」、2019年6月25日、[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600000/000637266.pdf\[2025-03-15\]](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600000/000637266.pdf[2025-03-15])。

④ “M”型就业模式是指各个年龄段的就业率连起来呈现“M”型特征，它是日本主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典型就业模式。

⑤ 李金凤：《压缩现代化视角下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演变及其时空特征》，《日本学刊》2024年第3期。

⑥ 曹有顺、胡澎：《自由与风险：个体化社会中日本女性的两难困境》，《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⑦ 日本人口学研究会『現代人口辞典』、原書房、2010年、247-249页。

龄上升到 28.4 岁, 女性也上升到 25.9 岁, 相较于 1970 年, 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 1.5 岁、女性推迟了 1.7 岁^①。由于日本官方在统计终身不婚率时, 取的是 45~49 岁和 50~54 岁两个年龄段未婚率的平均值^②, 所以单纯的晚婚化现象只意味着日本人推迟了结婚年龄, 不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普婚”状态。尽管 1990 年日本男性的终身不婚率上升到 5.57%, 女性也提升至 4.33%, 但是这依然意味着有约 95% 的日本人在人生某一阶段结婚、成家, “全民皆婚”社会并没有结束。由此, 我们看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至 90 年代初期的 20 余年里, 日本的婚姻模式逐渐从“早婚普婚”向“晚婚普婚”演变。

(三) 从“晚婚普婚”到“晚婚不婚”模式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日本社会再一次迎来转型。从宏观层面上看, 日本泡沫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崩溃, 自此进入了长期低迷期。“55 年体制”在 1993 年大选中以自民党的惨败而彻底崩溃, 日本政治由此陷入“漂流”状态。从中观层面上看, 职场上的流动化趋势愈发明显, 据《劳动力调查 (2024 年)》数据可知, 2024 年非正式员工已经达到 2126 万人, 占到所有雇佣者的 36.8%^③, 稳定的终身雇佣体系已经崩溃。从微观层面上看, 2022 年 15~64 岁的女性中有 72.4% 参与了劳动市场^④; 双职工家庭已经达到 1262 万户^⑤, “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变得完全模糊。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上的种种社会变化中可以看到,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构建起来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就已经瓦解, 社会变得更加流动。

伴随着日本社会的再次转型, 日本人的婚姻模式也再次发生变化。一方面,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日本人的初婚年龄继续推迟, 晚婚化程度不断加深。2023 年日本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提高到 31.1 岁, 女性也高达 29.7 岁^⑥, 与 1990 年相比又分别推迟了 2.7 岁和 3.8 岁。另一方面, 日本的“全民皆婚”时代结束, 不婚化现象开始显现并不断加深。不婚化是指终身不婚率不断攀升的现象^⑦,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后, 日本男性和女性的终身不婚率均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2020 年男性的终身不婚率已经达到 28.25%, 女性也提升至 17.81%, 这意味着在当今的日本社会, 有近三成的男性、近二成的女性选择了终身不婚的道路。从日本人居高不下的平均初婚年龄与持

①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 2025 年版』、2025 年 4 月 30 日、[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25.asp?chap=0\[2025-05-20\]](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25.asp?chap=0[2025-05-20])。

②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 2017 改訂版』、2017 年 4 月 10 日、[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17RE.asp?fname=T12-37.htm\[2025-05-10\]](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17RE.asp?fname=T12-37.htm[2025-05-10])。

③ 総務省統計局「労働力調査 (詳細集計) 2024 年平均結果」、2025 年 4 月 1 日、[https://www.stat.go.jp/data/roudou/sokuhou/nen/ft/pdf/gaiyou.pdf\[2026-01-22\]](https://www.stat.go.jp/data/roudou/sokuhou/nen/ft/pdf/gaiyou.pdf[2026-01-22])。

④ 内閣府『男女共同参画白書令和 5 年版』、2023 年 6 月 16 日、[https://www.gender.go.jp/about_danjo/whitepaper/r05/zentai/html/honpen/b1_s02_01.html\[2025-03-24\]](https://www.gender.go.jp/about_danjo/whitepaper/r05/zentai/html/honpen/b1_s02_01.html[2025-03-24])。

⑤ 厚生労働省『厚生労働白書令和 5 年版』、2023 年 8 月 1 日、[https://www.mhlw.go.jp/stf/wp/hakusyo/kousei/22/backdata/02-01-01-03.html\[2025-03-24\]](https://www.mhlw.go.jp/stf/wp/hakusyo/kousei/22/backdata/02-01-01-03.html[2025-03-24])。

⑥ 厚生労働省「令和 5 年人口動態統計月報年計 (概数) の概況」、2024 年 6 月 5 日、[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geppo/nengai23/dl/gaikyouR5.pdf.\[2025-02-17\]](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geppo/nengai23/dl/gaikyouR5.pdf.[2025-02-17])。

⑦ 日本人口学研究会『現代人口辞典』、原書房、2010 年、249 頁。

续攀升的终身不婚率中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日本的“晚婚普婚”模式又进一步向“晚婚不婚”模式演变。

二、“晚婚不婚”模式下日本的婚育特征

日本作为东亚国家，有着重视婚姻与家庭的传统，当婚姻模式进入“晚婚不婚”以后，国民的婚育特征尤其值得关注。据日本官方统计，现阶段日本的结婚率、平均初婚年龄等已经与西方大部分国家处于同一水平^①，笔者在日本与西方国家的比较中发现，在“晚婚不婚”模式下日本的婚育状态呈现出结婚意愿强、“单身寄生族”多、婚外生育率低的特征。

（一）结婚意愿强

晚婚、不婚可能是个体的主动选择，也可能是个体迫于某种压力的无奈之举，尽管两者作为事实或结果并无二致，但是就个体的结婚意愿而言却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可以将结婚意愿作为突破口，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来考察日本进入“晚婚不婚”模式后的婚育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少子化问题愈加严峻，日本政府开始将少子化作为国家重要课题积极应对，并从2005年起对同样面临少子化挑战的西方国家进行婚育观念调查。该调查每隔5年实施一次，最新发布的《少子化社会国际意识调查》显示，2020年日本与西方国家在“必须结婚”观点的支持率上并无明显差异，日本支持“必须结婚”的比例为3.6%，法国为5.5%，德国为8.3%，瑞典为2.5%。可以说，日本与西方国家“必须结婚”的支持率几乎处在同一水平，甚至还略低于法国和德国。但是，在“最好结婚”这一观点上日本与欧洲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44.2%的日本人支持“最好结婚”观点，而德国只有30.5%的支持率，法国与瑞典的支持率更低，仅有23.1%和21.2%^②。如果将“必须结婚”和“最好结婚”两种观点归为“有结婚意愿”的话，可以发现当代日本人的结婚意愿明显强于西方国家。日本国内对国民的结婚意愿的调查更为细致，例如，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自1982年开始对18~35岁未婚者的结婚意愿进行了长期调查。根据该机构的调查数据，截至1992年日本有九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总有一天要结婚”，尽管此后这一比例出现下降趋势，但是2021年的数据显示，依然有81.4%的男性和84.3%的女性表示自己“总有一天要结婚”^③，可见日本人的结婚意愿依旧强烈。

① 2023年日本结婚率为3.9%，欧洲诸国情况虽然各异，但是大部分国家的结婚率在3%~5%之间。2019年日本的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1.2岁，女性为29.6岁，欧洲大部分国家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32岁上下，女性在30岁左右。参见：総務省統計局『世界の統計2025』、2025年2月、<https://www.stat.go.jp/data/sekai/pdf/2025al.pdf>；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4版)』、2024年5月10日、<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24.asp?chap=6>。

② 内閣府『令和2年度少子化社会に関する国際意識調査報告書』、2021年6月12日、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13024511/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research/r02/kokusai/pdf/zentai/s4_1.pdf [2025-04-03]。

③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現代日本の結婚と出産—第16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独身者調査ならびに夫婦調査）報告書—』、2023年8月31日、https://www.ipss.go.jp/ps-doukou/j/doukou16/JNFS16_ReportALL.pdf [2025-04-03]。

通过上述国际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 虽然日本与欧洲国家的婚姻都进入了“晚婚不婚”模式, 但是相较于欧洲人没有结婚意愿的不婚, 日本人则是有着较强的结婚意愿却没有走进婚姻。因此, 有学者将结婚意愿低、结婚率也低的欧美国家称作“不需要婚姻社会”, 而将有结婚意愿却难以实现结婚行为的日本称作“结婚难社会”^①。

(二) “单身寄生族”多

婚姻是家庭的基石, 也是亲密关系的载体, 当一个国家的婚姻进入“晚婚不婚”模式后, 国民的亲密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 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日本人与欧美人在亲密关系上的差异, 来考察日本在晚婚、不婚社会里呈现出的婚育特征。亲密关系有多种表现方式, 如互动、同居、恋爱、结婚等, 在这些方式中未婚者的居住方式尤其值得关注, 因为它既是构建亲密关系的结果, 也是亲密关系程度的体现。

非婚同居在西方社会是替代婚姻构建亲密性的重要手段, 而日本社会却很排斥这种行为。2020年一项关于婚姻的国际调查数据显示, 瑞典有32.9%的人认为“可以不结婚, 但是最好能同居”, 德国与法国分别有32.5%和23.3%的人支持这一观点, 而在日本持有此观点的人仅有2.3%。日本与西方国家对待非婚同居的不同态度不仅体现在意识上, 更体现在行为中。在此次调查中, 仅有0.9%的日本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同居”, 而瑞典的“正在同居”比例高达32.5%, 德国与法国稍低一些, 但也分别达到23.7%和25.2%^②。在不热衷于婚姻又排斥非婚同居的日本, 单身者乐于同父母一起居住, 成为“单身寄生族”^③。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公布的第七次调查数据, 日本18岁以上群体中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达到21%, 而在欧美国家中, 即便是比例较高的德国、美国、英国、瑞典也只是一成左右, 分别为11.7%、10.8%、10.1%和9.5%, 法国仅有6.4%^④。这些数据中包含了已婚者。考察日本的“单身寄生族”规模还需要更为细致的计算,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研修所西文彦研究员的计算, 在25~29岁年龄段的青年中, 1980年时未婚且与父母同住的245万人, 到2016年扩大至298万人, 比例也从27.2%提升至46.5%; 在30~34岁年龄段青年中, 未婚且与父母同住者数量从1980年的91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191万人, 比例从8.5%增长到26.6%; 35~39岁和40~44岁年龄段未婚且与父母同住者数量增长速度更快, 分别从1980年的26万人和13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146万人和142万人^⑤。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晚婚不婚”模式下, 欧美人倾向于以非婚同居的方式重新构建一种新的亲密关系, 而日本人乐于寄生于父母来维持原生家庭带来的精神支持。“单身寄生

① 山田昌弘『結婚不要社会』、朝日新聞出版社、2019年、177-178頁。

② 内閣府『令和2年度少子化社会に関する国際意識調査報告書』、2021年6月12日、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13024511/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research/r02/kokusai/pdf/zentai/s4_1.pdf[2025-04-03]。

③ 单身寄生族 (Parasite single) 是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1997年提出来的概念, 指大学毕业以后仍然与父母住在一起, 过着小资生活的单身男女。参见: 山田昌弘『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筑摩書房、1999年、21頁。

④ 社会実情データ図録「親との同居比率の国際比較 (2017—2020年)」、2021年12月24日、<https://honkawa2.sakura.ne.jp/2422.html>[2025-04-03]。

⑤ 西文彦「親と同居の未婚者の最近の状況 (2016年)」、2017年2月3日、<https://www.stat.go.jp/training/2kenkyu/pdf/parasi16.pdf>[2025-04-03]。

族”众多成为日本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婚育特征之一。

（三）婚外生育率低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育作为人类繁衍后代的本能，本质上与婚姻制度并无直接关系。然而，不同国家存在着不同的婚育制度、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将生育与婚姻绑定在一起。因此，当婚姻模式进入“晚婚不婚”以后，婚外生育状况将成为考察不同国家婚育特征的切入点之一。

2021年，公益财团法人日本财团（Nippon Foundation）进行了一项涉及结婚与生育关系的国际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有66.6%的人认为“结婚是生育的前提条件”，而被调查的欧洲国家赞同这一观点的比例普遍较低，如意大利、法国、丹麦和挪威分别为17.6%、13.4%、12.2%和11.4%。与之相反，日本只有14%的人认为“结婚不是生育的前提条件”，但挪威、法国、丹麦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比例却很高，分别达到了84.8%、82.4%、82%和76.8%^①。由此可见，日本相较于西方国家存在着强烈的婚内生育规范，结婚与生育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这种紧密的关联使得婚外生育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越轨行为，从而导致日本人无论在观念层面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排斥这种行为。日本财团的调查还显示，日本有65%的受访者表示排斥未婚生子，而丹麦、法国、意大利和挪威等欧洲国家仅有一成左右的人表示排斥这种行为，占比分别为12.4%、10.8%、9.6%和6.8%。实际上，日本与西方国家对待婚外生育的态度差异也表现在生育行为上。近年来，西方有些国家的婚外生育率已经超过一半，例如法国已经高达62.2%，挪威也上升到58.5%，美国和德国稍低一些，也分别达到40.5%和33.1%^②。然而，日本的婚外生育率自二战结束以后一直保持着平稳且偏低的状态，近年来虽然略有上升趋势，但是也才刚刚超过2%，2022年仅仅有2.3%^③。

总而言之，当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婚姻进入相同的“晚婚不婚”模式以后，在生育上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在西方社会，人们即使不结婚，生儿育女也没有思想负担，甚至部分国家的婚外生育率已经超过一半，但是日本社会对婚外生育依然保持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婚外生育率至今还徘徊在2%到3%之间，这意味着日本社会是一个不结婚就基本上不会生育的社会。

三、“晚婚不婚”模式对日本社会的冲击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晚婚不婚”模式给日本人带来了多样化的生命历程，结婚或者不结婚、何时结婚这些问题成为个人的自由选择，个人、家庭、社会由此变得更加多元。但是，在婚姻依然是组建家庭的前提、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础单位的情况下，日本的婚

① 公益財団法人日本財団「女性意識調査第3回『少子化に対する意識・国際比較』」、2021年3月17日、https://www.nippon-foundation.or.jp/wp-content/uploads/2021/03/new_pr_20210317_03.pdf[2025-04-04]。

② 内閣府「令和5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2023年7月25日、https://www5.cao.go.jp/jj/wp/wp-je23/h07_cz0201.html[2025-04-07]。

③ 社会実情データ図録「婚外子（非嫡出子）割合の推移」、2024年6月8日、<https://honkawa2.sakura.ne.jp/1518.html>[2025-04-05]。

姻模式变化将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特别是婚姻模式进入“晚婚不婚”之后, 以“早婚普婚”为前提构建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从而引发或者加剧一些社会问题。

(一) “晚婚不婚”模式加剧日本社会的少子化

如上所述, 日本的生育与婚姻紧密联系在一起, 甚至是一个不结婚就不生育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与婚育规范下, 个体选择晚婚或者不婚将直接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 而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意味着少子化问题愈加严峻。

1989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57, 引发日本社会高度关注, 少子化问题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成为学术界、媒体界以及政府关注的热门话题。探讨日本少子化成因的研究有很多, 其中内阁府总结的较为全面, 认为晚婚化、不婚化以及已婚女性生育率下降是少子化的主要原因^①。但是, 表示日本已婚女性平均生育数量的“完成生育数”从1977年的2.17上升到2002年的2.23, 继而下降至2021年的1.9^②, 在过去50年里大致上在人口更替水平^③上下浮动。可以说, 日本社会出现少子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并非已婚女性生育情况的改变, 而是婚姻模式的变迁。日本白秋社编辑组对日本近半个世纪以来结婚率与总和生育率双双下降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分析, 发现结婚登记对数、初婚人数、初婚比例与出生人口数量都存在相关关系, 其中相关系数最高的是初婚人数, 因此他们主张初婚人数的减少是日本少子化的决定性因素^④。日本人口学家岩泽美帆的多因素分析更加精准地表明, 日本总和生育率从2.01下降到1.38, 约90%可以从初婚变化中得到解释^⑤。日本的婚姻与生育紧密关联, 婚外生育观念暂未被人们接受, 婚外生育行为一直遭到排斥, 当20世纪90年代日本进入“晚婚不婚”模式以后, 少子化问题自然也将随着晚婚化、不婚化程度的加深而变得愈加严峻。

(二) “晚婚不婚”模式加重日本社会的养老负担

在日本传统社会, 家庭或家族主要承担着老年人的养老重任, 并以孝道使家庭养老模式代代相传。然而,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 日本家庭的规模逐渐缩小, 难以承受赡养老人的重担, 使养老问题亟须突破家庭的界限, 获得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以后,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开始流行, 它超越了传统的家庭主义, 主张社会福利应该有多种来源^⑥。联合国社会开发研究所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提出了看护四边理论 (care diamond), 用于

① 内閣府「選択する未来—人口推計から見えてくる未来像—」、2015年10月、https://www5.cao.go.jp/keizai-shimon/kaigi/special/future/sentaku/pdf/p030102_01.pdf[2025-04-05]。

②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現代日本の結婚と出産—第16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独身者調査ならびに夫婦調査)報告書—』、2023年8月31日、https://www.ipss.go.jp/ps-doukou/j/doukou16/JNFS16_ReportALL.pdf[2025-04-03]。

③ 人口更替水平是指在没有人口流入、流出前提下, 人口总量长期保持不增不减状态下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进入21世纪以后, 日本的人口更替水平在2.07上下浮动。参见: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3年版)』、2023年4月21日、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23.asp?fname=T04-03.htm。

④ 白秋社編集チーム『未婚化する日本』、白秋社、2021年、27頁。

⑤ 高橋重郷・大淵寛『人口減少と少子化対策』、原書房、2015年、49-72頁。

⑥ 周维宏:《社会福利政策的新基本原则:“看护四边理论”及其研究课题》,《社会政策研究》2016年第1期。

说明和比较各种社会看护供给源的形式^①。郭佩将看护四边形理论运用到日本老年看护责任分担比例测算上，通过京都市的案例调查发现，看护四边形理论的四角之中“家庭（59.1%）”所占比例最大，其次为“市场（28.5%）”和“国家（12.2%）”，“非营利组织/社区（0.2%）”比例最小^②。可见，在日本的老年人护理上，市场、国家、社区虽然发挥着一定作用，但是家庭依然是最主要的责任主体。

在日本，婚姻是家庭的起点，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晚婚甚至不婚时，家庭正在成为乌尔里希·贝克笔下的“僵尸范畴（zombie categories）”^③，逐渐丧失了被赋予的一些功能。这样一来，看护四边形理论中的“家庭”一角在养老领域中自然就难以发挥作用，势必会加重国家、市场、社区的养老负担。如若国家、市场和社区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补强因家庭缺失而弱化的部分功能，“晚婚不婚”模式对养老领域的冲击尚且不大，但是在少子化叠加老龄化背景之下，一方面，缴纳养老金的人逐年减少而养老金支付额逐年增大，国家主导下的养老体系正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另一方面，市场与社区虽然正在探索新型养老方式，但是似乎仍然没有找到稳定、有效的解决办法。未来，日本的“晚婚不婚”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养老问题将长期困扰着个人、家庭和政府。

（三）“晚婚不婚”模式加深日本社会的无缘化

日本社会存在着清晰、明确的社交界线，人与人之间并不容易产生较强的联系，其中以家庭为中心的血缘、以地域为中心的地缘和以公司为中心的业缘共同组成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在血缘、地缘与业缘当中，纵向的父子关系是日本社会结构的主要基点，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优先于其他任何关系^④。

在婚姻是生育前提的日本社会，血缘关系的再生产主要依赖婚姻的成立。日本的婚姻模式进入“晚婚不婚”以后，家庭作为日本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核心单元，一方面规模越来越小，2022年平均每户仅有2.09人；另一方面“一人户”家庭成为日本户数最多的家庭类型，2020年多达2115.1万户，占比达到38%^⑤。家庭关系网的萎缩，加速了日本人际关系的稀薄化。2010年1月由日本放送协会（NHK）录制的纪录片《无缘社会——3万2千人“无缘死”的冲击》正式上映，纪录片通过多个“一个人孤零零死去，死后也没有人来处理后事”的案例向人们展示了日本社会血缘、地缘、业缘不断弱化的现状。由于案例中展现的内容与很多人的生活高度相似，影片一经放映便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无缘社会”不仅入选当年的十大流行语，也成为日本人际关系的真实缩影。未来，随着晚婚、不婚化程度的持续加深，日本家庭规模还将进一步缩小，预计平均每户家庭人数在2033年将跌破2人，

① 落合惠美子『親密圏と公共圏の社会学 ケアの20世紀体制を超えて』、有斐閣、2023年、182頁。

② 郭佩：《日本老年照顾责任分担比例测算研究——基于“照顾四边形”理论视角》，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49页。

③ 僵尸范畴（zombie categories）指代那些制度性存续但实际已失效的传统社会分类体系，例如家庭、阶级等概念，它们虽已僵死，人们却依然在用。参见：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譔、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37页。

④ 中根千枝『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講談社現代新書、1967年、32頁。

⑤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 2025年版』、2025年4月30日、[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25.asp?chap=0\[2025-05-20\]](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25.asp?chap=0[2025-05-20])。

下降至 1.99 人; “一人户”家庭占比将在 2050 年达到 44.3%^①。如果日本人无法在家庭之外重新构建一种稳定的人际关系, 在“晚婚不婚”模式下, 日本的人际关系网络还将继续稀薄化, 社会的无缘化与孤独感还将蔓延。

四、日本婚姻模式转型的镜鉴意义

中国的婚姻模式正在由“早婚普婚”向“晚婚普婚”转变, 但是这一转型过程尚未结束, 将来会定型于何种模式尚不明确。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内婚姻相关的定量、定性研究固然重要, 国外的婚姻转型经验亦有参考价值。通过对日本婚姻模式转型经验的深入研究, 或可为认识与分析中国婚姻模式转型提供以下几点参考。

第一, 从日本婚姻模式的演变历程看, 中国的婚姻有可能会沿着日本的演变轨迹, 在“晚婚普婚”之后步入“晚婚不婚”模式。如上所述, 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至 90 年代初期, 平均初婚年龄持续攀升, 但终身不婚率却没有明显变化, 婚姻模式经历了“早婚普婚”向“晚婚普婚”的转变。然而, 从长期看, 日本的“晚婚普婚”模式并不稳定, 经过 20 年左右的不婚化萌发期,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后进入了“晚婚不婚”模式。无论是以 45~49 岁年龄段的未婚率还是以 50 岁时的未婚率来近似反映终身不婚率, 理论上讲, 一个人即使不结婚也只有到 45 岁以后才会对终身不婚率数据产生影响, 终身不婚率在统计上的“滞后性”掩盖了不婚化的最新动向^②, 导致仅从终身不婚率数据上难以看清婚姻模式的走向。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婚姻模式的发展动向无迹可寻, 从日本婚姻模式的演变情况看, 在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攀升的时候, 青壮年群体的未婚率也在不断攀升, 经过若干年后发现, 曾经没有结婚的青壮年群体中到 50 岁还没结婚的比例依然很高。可见, 青壮年群体未婚率的持续攀升有可能带来不婚化现象。中国的婚姻正处于“早婚普婚”模式向“晚婚普婚”模式转型且青壮年未婚率持续攀升阶段,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30~34 岁男性未婚率从 2000 年的 7.45% 提升至 2020 年的 20.55%, 女性从 1.35% 上升至 9.33%; 35~39 岁男性未婚率从 4.12% 提升至 9.36%, 女性从 0.51% 提升至 4.14%^③。参照日本婚姻模式的演变历程和中国近年来的婚姻数据变化, 中国的婚姻模式有可能会经历数十年的“晚婚普婚”模式后进入到“晚婚不婚”模式。

第二, 从日本“晚婚不婚”模式下的婚育特征看, 中国也有可能迎来“结婚难”社会。据民政部的统计, 近年来中国的结婚登记对数不断减少, 结婚率呈下降趋势^④, 未来也有可

①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世帯数の将来推計令和 6 年推計」、2024 年 4 月 12 日、https://www.ipss.go.jp/pp-ajsetai/j/HPRJ2024/hprj2024_gaiyo_20240412.pdf[2025-05-25]。

② 曹有顺、胡澎:《日本的不婚化现象探析》,《日本学刊》2025 年第 2 期。

③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数据。

④ 2020 年中国的结婚率为 5.8‰, 2021 年下降至 5.4‰, 2022 年下降至 4.8‰, 2023 年虽然上升至 5.4‰, 但是 2024 年再次下降至 4.3‰,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参见:《2024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 2025 年 7 月 30 日, <https://www.mca.gov.cn/gdnps/n2445/n2451/n2458/n2681/c1662004999980006189/attr/400985.pdf>。

能迎来低结婚率的不婚社会。按山田昌弘根据结婚意愿对不婚社会的区分,中国有可能和日本类似,进入一种结婚率低、但结婚意愿强的“结婚难”社会。一方面,家庭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处于基础地位,是个体抵御社会风险的关键屏障,个体需要通过婚姻组建家庭来抵御风险。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社会对非婚同居、婚外生子的观念还难以接受,需要通过婚姻家庭来构建稳固的亲密关系。在婚姻是组建家庭前提的中国社会,婚姻无论在经济生活中还是情感生活中都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即便部分年轻人表示不想结婚,但是近期的调查显示,在适龄未婚人群中,有75%的人有结婚打算,即使在25%的不婚人群中,80%以上也属于非坚定不婚者^①,可见中国人的结婚意愿依旧强烈。然而,近年来中国青年人的婚姻也面临着一些难题。例如,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婚姻领域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农村男性青年遭受着初婚市场和再婚市场的双重婚姻挤压,面临结婚难、易离婚、再婚难等系列婚配困境^②。又如,中国女性的“上嫁(hypergamy)”观念依旧浓厚,女性的高学历化让低学历的男性和高学历女性都面临结婚难的困境。另外,个人主义兴起、性别比例失衡、高额彩礼习俗等因素也都使中国青年的婚姻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从“晚婚不婚”模式对日本社会的冲击看,中国进入“晚婚不婚”模式以后可能会加速生育率下滑。如上所述,生育本身虽然与婚姻制度无关,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将生育与婚姻联系在一起。其中,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更加强调家庭在社会中的价值,主流文化排斥婚外生育行为,并由此展现出婚姻和生育之间的强关联特征^③。这一特征主要体现为婚外生育率低,日本2020年的婚外生育率即便达到1950年以来的最高值,但也仅为2.38%,与50%左右的欧美国家相比差距悬殊。中国社会与日本类似,同样对非婚生育的接受度不高,婚外生育率非常低。宋健等学者基于2010—2016年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婚外生育率进行推算,发现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未婚生育比例不高于1.2%^④。从日本的经验看,当婚姻进入“晚婚不婚”模式以后,社会的总和生育率将会持续走低,即便日本政府不断出台和完善少子化对策,其效果也是微乎其微,难以有效遏制少子化的发展。中日两国对待婚外生育的态度高度相似,未来中国的婚姻一旦进入“晚婚不婚”模式,很可能也会加速生育率下滑。

结 语

日本的婚姻模式在战后80年里经历了两次转型,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早婚普婚”模式转变成如今的“晚婚不婚”模式。在“晚婚不婚”模式下,日本的婚育状况相较于欧美国家呈现出结婚意愿强、“单身寄生族”多、婚外生育率低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婚姻在当今日本社会依然占据重要地位,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然而,随着日本的

① 《不婚面面观—中国当代不婚现象白皮书》,世纪佳缘网、艾瑞咨询网,2021年8月, <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2108/3827.shtml>[2025-04-20]。

② 孙新华:《婚姻挤压与农村代际关系变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③ 李婷、王强:《中国婚姻模式变迁对生育的影响——与日韩的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24年第6期。

④ 宋健、郑航:《非婚生育走向何处——比较视野下的婚育模式变迁》,《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晚婚不婚”趋势日益深化，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以及在家庭之上构建的社会制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不仅加剧了少子化，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还加深了“社会无缘化”现象，成为阻碍日本社会发展的难题。

当前，中国的婚姻模式正处于重大转型之时，正在由“早婚普婚”向“晚婚普婚”转变。在此背景下，战后日本的婚姻模式转型、转型后的婚育特征以及转型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等，都对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密切关注当下青年人的婚姻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以减缓甚至避免婚姻模式转型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冲击，而且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总结日本婚姻转型的经验教训，关注日本的婚育政策调整方向。这将有助于中国在应对婚姻转型问题上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责任编辑 孙丽]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riage Patterns in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CAO Youshun¹, HU Peng²

(1. School of Global and Reg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2.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Japan's marriage patterns have undergone two major transformations After World War II. The first transition began in the early 1970s, shifting from "early and universal marriage" to "late but still universal marriage". The second emerged after the 1990s, as "late but universal marriage" further evolved toward "late marriage and non-marriage". As an East Asian country, Japan traditionally places strong emphasis on marriage and family. After entering the stage of "late marriage and non-marriage", Japan's marital and fertility behaviors have displaye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to Western countries; a stronger stated desire for marriag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parasite singles", and a lower rate of childbearing outside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society, marriage remains the prerequisite for family formation, and the family continues to serve as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society. The "late marriage and non-marriage" pattern has brought about a series of social issues in Japan, not only exacerbating the low fertility rate but also increasing the burden of social elderly care and deepening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disconnectedness. Currently, China's marriage pattern is transitioning from "early and universal marriage" to "late but universal marriage". Against this backdrop, studying Japan's marital transformation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ongoing changes in marriage patterns in China.

Key words: marriage patterns; social impact; low fertility rate; population development